
留日学生与清末浙江变革

徐立望

(历史学博士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杭州 310028)

【摘要】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和日本处于全面紧密合作时期。浙江得风气之先，留日运动无论是出国规模还是回国后的影响程度，都处在全国的前列。以往的留日运动研究，学者多把留日学生从中国社会阶层剥离，视作独特的群体，浙江的相关研究亦是如此。但事实上，留日群体虽有新学背景，却原传统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与传统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回国后与传统社会阶层的冲突、互动和整合，反映出浙江留日学生在清末社会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并由此呈现出清末中国变革的缩影。

【关键词】晚清；浙江；留日学生；变革

一、前言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将向日本学习视为达到西方式富强的捷径，两国关系密切，以至于有学者提出此期间的中日关系是黄金十年。^①近年来，学界旨趣有所变化，从通论式和整体式的留日运动研究，逐渐开始转向某一区域或某一时期的局部和微观研究，以期更深入理解留日运动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变迁的关系。以某个省份为中心的留学生运动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关于浙江的研究即是其中之一。在中国诸多留日省份中，浙江因处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得风气之先，无论是出国规模还是回国后的影响程度，都处在全国的前列。与浙江在当时留日运动之地位相匹配，今人在此区域的研究水准也是相应甚高。吕顺长、何扬鸣等诸位学者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②

我们发现，学者的研究多把留学生从中国社会阶层剥离，视作独特的群体，浙江的相关研究亦是如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研究浙江清末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论著，又往往把各个阶层视为一个整体，并未加以细致的划分，以至于往往忽视了留日学生在其中发挥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留日群体虽有新学背景，却原传统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与传统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观察他们归国后与传统社会阶层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才能全面理解浙江留日学生在清末社会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由此来把握清末中国变革的进程。

二、传统社会阶层的加剧分化与留日群体的出现

为什么到日本留学?答案很清楚——甲午战争日本对中国的完胜，直接刺激中国重新审视近邻的发展成就。由此，清政府的政策引导、日本政府的主动参与和接纳、官员和士绅的鼓动、赴日成本的低廉、中日文化的类似性、以及中国民众的救亡意识等诸种因素，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向他国学习的历史进程。

清末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在1898年刊行的《劝学篇》中，得出一个比较留学日本与西洋之优劣的结论：“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①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章。

② 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何扬鸣：《浙江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浙江留日学生辛亥革命时期报刊活动述评》，《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随即朝廷颁布鼓励留学日本上谕，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段话。

由于张之洞在晚清政局具有重大影响力，世人多认为他的论述开启了国人留学日本意识觉醒。但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已经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1894-1898年在任的浙江巡抚廖寿丰说：“东瀛学制原本西洋，伦理、汉文仍乃旧贯，历史、舆地本国为先，得要从宜，可谓善变。综其大指，不外由浅而深，由近而远二语，与古人循序渐进之旨吻合。……日本地属同洲，其课程、课书，大可以备参考。”^②正是由于廖寿丰、林启等主政官员的推动，浙江派出了清政府第一批官费留学生。1897年8月杭州蚕学馆获准成立，在申请设馆时，草拟的章程就明确以向日本学习为宗旨，“先行翻译日本蚕书图说，成书后要广为传播”^③。同年11月，尚未开学的蚕学馆，就在维新人士罗振玉和大阪华商孙淦的建议下，派出德清嵇侃和杭州汪有龄两名学生赴日学习蚕学，这两人也成为国内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开创了留学日本的先河。^④1898年6月，浙江又派出求是书院学生何燠时、陈槐、陆世芬、钱承志等四人赴日学习。两个月后，清廷才颁布留日学习的上谕。

我们注意到，求是书院派出的四人，专业分布比较均衡，何、陈、陆、钱分学冶金、兵工、商业和法政，加上去年从事蚕学的二人，可见当时较为重视实业和工商业，这也是洋务运动以来求富求强、强调实学的具体反映。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长期发展，将会出现传统社会阶层之外的拥有专业技能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此类技术精英阶层政治态度相对较为温和，本质上并不会挑战既得利益群体控制的政治资源，却又有所互补，较少与传统阶层发生冲突，反而能共享社会变革的益处。然而这种充满美好愿景的设计蓝图，却被充满忧患意识的国人一再修改。汪有龄是浙江最早派出的两名官费留学生之一，奉命赴日考察蚕务，但在时局刺激下，他已很难静下心来埋头苦读。从日本寄给汪康年的信件中，汪有龄充满着对于政局的忧虑和自我责任感的强调，“大局日非，伏莽将起，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⑤他决定改变留学初衷，改学法政专业，而重换专业实非易事。为了取得当局的理解，汪有龄把留日期间所写的日记寄给杭州知府林启和浙江巡抚廖寿丰。林启读后，认为“语多悲愤，足见有心时局”，廖寿丰对其也非常推许。^⑥汪有龄最终被允许改学专业，后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他的举动，预示着未来浙江乃至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风向。

1900年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痛定思痛，改弦易辙，掀起全面改革的热潮，亟需大批军事、教育、法政等方面的人才，此等新式人才极度缺乏，只能求助于赴日速成，而原有之派人出国学习实业、引进先进技术、逐步改变国家面貌的计划遂宣告破产。1901年9月，清廷颁布全面改革的上谕：

造就人才，实为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前往学习。于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⑦

此时的浙江仍走在全国前列，以浙江最高学府——求是书院为例，是年春天派遣蒋方震、王维忱等18人赴日留学，1902年又资助许寿裳、钱家治、周承蒔、厉家福、沈启芳等赴日，日后二蒋及周任职军界，许、钱、王则从事教育事业。浙江学生留日的专业布局，也是中国留日学生的缩影。

随着新政的大规模展开，这场暴风骤雨的运动，迅速驱使大批各阶层人士赴日，随之则出现了具有留日背景的新式军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救亡的意识如此之强烈，国家和民众都已急不可待，以致于留日学习的时间一再压缩——普通科三年的学习时间太长，就变成速成科一年半，后来还是嫌过长，更是仅仅六个月就要求毕业。1908年1月3日学部奏定的“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学生名额折”曾提到：

①张之洞：《劝学篇》（下），游学第二，第6页，《张文襄公全集》第20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

②廖寿丰致汪康年信，《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4页。

③《设立养蚕学堂章程》，《集成报》第19卷。

④郑晓沧：《戊戌前后浙江兴学纪要与林启对教育的贡献》，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

⑤汪有龄致汪康年信，《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1058页。

⑥林启致汪有龄信件，《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1077页。

⑦《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422页。

在日本留学之人数，虽已逾万。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科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耳。^①

学制的缩短促使留日人数急剧增加，而清廷鼓励官员留日举措的出台，又极大地扩充了留日学生的来源，也大幅提升了留日学生对于国内政局的影响力。

1903年6月，云南巡抚林绍年奏：“滇省需次人员，罕晓时务。兹当续遣学生出洋，特于候补各员中。选其明达可造者，一同游学日本。并添设中学教习随往，以资督率。”^②

1906年9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湖南湖北两省，新选新补实缺州县拟派令出洋游历。”^③

从边疆地区的云南，到中部省份的湖广，中央政府和各地督抚已达共识，将官员出洋学习和游历作为一项政治改革基本政策。1906年5月，清廷根据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奏议，又决定遴选四十至五十名“志趣正大、学问优长，有志出洋者”之翰林，分游学与游历两项出国。^④

同月稍后，御史陈庆桂之“遴选科道部曹出洋游学游历”奏议，经政务处讨论，决定由学部设立法政学堂，作为游学预备，三年毕业后由学部咨送出洋肄习，经费由各该衙门筹给。^⑤

拥有相同的学习背景，又掌握了新时代的知识，留日学生们相互提携，很快成为统治阶层中的新贵，而新政改革所提供的大量空缺职位，因专业技能要求，势必只能为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和留日者所占据，故而留日人士成为清末新政改革的中枢力量。清政府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陆续设立了新官制编制馆、宪政编查馆等官制革新的中枢机构，这些重要的机构，即掌握于留日人士之手，彼等又借此平台，进一步挤压传统保守阶层之利益空间，形成人数极为庞大的留日阶层。

诚如徐珂所述：

留学生居各部要津，部曹最清苦，自晚近举行新政，设立新部，如外务、民政、邮传、农工，其组织皆采新法，经费裕，人才多，都人士所啧啧称羨者也。其得上峰赏拔居要津者，大抵皆东西洋留学生。^⑥

汪康年则对留日法政人员之优越感加以讽刺：

杭人有久客外者，归遇一故交，则趾高气扬，非复前之态度矣。问其所为，则法政学员也。且忿然曰：“吾父前者徒知用压力，否则如破慳囊使吾出洋，则今以毕业生归，官大金多，易中事矣！”语讫不胜忿慨。^⑦

清廷通过中下层官员及翰林的出洋，力图填补新政人才的缺乏，掌控留日学生资源，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留日人士无论学生或是官员，在日本领略了先进的政体、激进人士的革命鼓吹、以及相对自由的新闻舆论，他们由此跳出了自身的窠臼缺陷，对于清廷的统治或多或少有了异样的认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背离了清廷的初衷，反而成为推翻帝制的极其重要的力量。浙江嘉兴人沈钧儒的经历或许能说明此点。1904年中进士后，沈钧儒签分法部主事，1905年就被清廷派去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深受日本宪政运动的影响，很快就投入国内预备立宪运动，于1907年5月向政府提交《民选议员请愿书》。回国后，沈钧儒积极参与浙江地方自治运动，并于1909年当选为浙江谘议局副议长。对清廷的立宪举动失望后，他又积极与各方政治势力联系，

①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9年，第133页。

②《清实录》，第58册，第817页。

③④⑤《清实录》，第59册，第442、390、396页。

⑥徐珂编《清稗类钞》，第2册，中华书局，第715页。

⑦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66页。

投入光复浙江行动之中。短短几年，沈钧儒从清廷官员转变成成为清廷的反对者，留日的经历对他至关重要。在日本获得的现代法政知识让他认识到，他首先是国家的公民，而非仅仅只是对清廷效忠的官员。挣脱了专制社会统治阶层所竭力灌输的愚忠思想的束缚，他的转变也就迅速、自然而合理。

三、留日学生与浙江自治运动、宪政运动

在政府的引导和开明人士鼓吹之下，留学之举动固然有大批人士趋之若鹜，反对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反对者中既有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也有既得利益的损害者，甚至包括开明的士绅，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传统功名的拥趸者敌视新晋阶层

《清稗类钞》记载：

宣统己酉，学部奏酌拟考试毕业游学学生章程，中有分等给奖一条，列最优秀者奖给进士，列优秀、中等者奖给举人。各冠以某学科字样，习文科者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他科仿此。顽固之人以若辈皆自东西洋游学而归也，辄以异路功名视之，谓之曰洋进士、洋举人。斯言也，盖有彼哉彼哉之意焉。^①

(二)担忧皇权统治和纲常伦理受到威胁

1906年10月，翰林院官员李传元奏：请令游学之士，补习中文。^②1909年8月监察御史胡思敬奏：

近闻东洋留学生，党派甚多，各省皆有领袖。潜相勾引，煽动四方。以洪秀全、杨秀清为英雄，以张汶祥、徐锡麟为义烈，托之文字诗歌，极口赞扬。内地学生，遥相唱和，不设计禁阻，而反提倡民权。罔民而陷，独何心乎。……送一出洋学生，岁破七八百金。自学务大兴，祇日本一国，每岁吸我膏血，不下数千万金。^③

(三)留学生学非所用，破坏原有政治官僚体系

1909年10月，御史赵熙奏：

考试游学毕业生名单……以向例言之，皆有入翰林之望。夫以专门实业之士，充文学侍从之臣，责以撰文之任，所习非所用，彰彰明矣。即优秀中等内凡农工商医诸科，以之为内阁中书，为知县，为不相当之主事，亦与立法之意相悖。是非可视为细故也，所习非所用，该生将无可办之事，而遇事又无可用人。^④

(四)留学日本者最多，大抵只重文科与军事，鲜有及于实业、自然科学者

国内颇有影响力之《中外日报》一直敦促政府改革，1904年6月1日却刊载《论士人不讲求实业之非》一文，对留日学生的专业加以批评：

士大夫于农工两途，亦复不屑注意。试观游学日本诸生，其所占科目率不越文学、法律、政治数门，而近年新出译述诸书，浩如烟海，亦大约不出数门。较诸同治年间江南制造局所译算学、化学诸书，虚实之分，便已判然。^⑤

①徐珂编：《清稗类钞》，第2册，第600页。

②《清实录》，第59册，第462页。

③④《清实录》，第60册，第442、394页。

⑤《东方杂志》将此文摘录，见其第1卷第6号(1904年)，“实业”第63页。

正是出于以上几方面的考虑，众多官员敦促中央政府弃用或慎用留日学生。官员和士绅们忧心忡忡，担心留日人士抛弃纲常伦理，背离忠君思想。大学士陆润庠的一段话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游学诸生，于实业等事学成而归者，寥寥可数，而又用非所学。其最多者惟法政一科。法政各国歧异，悉就其本国人情风俗以为制。今诸生根柢未深，于前古圣贤经传曾未诵习，道德风尚概未闻知，袭人皮毛，妄言改革；甚且包藏祸心，倡民权革命之说，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布其党徒，潜为谋主。各部院大臣以为朝廷锐意变法，非重用学生不足以称上旨，遂乃邪说流行，遍播中外，久之必致根本动摇，民生涂炭。

不幸的是，历史事实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判断——留日运动固然能为清廷培养大量的新政人才，但是也为它培养出足够的异己分子。清末新政的改革千头万缕，矛盾重重，但是归结于一点，即是民权与皇权的冲突与进退。

早期留日的人们，看到清廷在俄国层层进逼之下屈辱地退让，看到日本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意识到凝聚民众力量的地方自治无疑是救亡图存的大道。他们所办的各类报刊，竭力鼓吹地方自治的意义，希望能在国内掀起地方自治的浪潮，在日浙人所办的《浙江潮》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03年2月《浙江潮》第一期发刊词即言：“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第二期发表《敬告我乡人》，直言“中国之改革实业，其前途之最有望者，莫过地方自治者”，强烈呼吁浙人勇于冲破藩篱，担负起地方自治的重责。“地方自治之问题，在今日如新出世的产儿，其即能圆满直进乎？抑亦将一旦陷于悲境辗转而始达其目的乎？某以为其责在诸君而已。诸君！诸君！地方自治者，诸君之天职也。”正是由于浙江留日人士将地方自治视为中国强盛之道，认为不从地方自治着手，“虽日日言强中国无益”。他们的声声呼唤，很快得到国内开明官员的回应和支持。两位浙江官员孙宝琦和沈家本分别在1904年和1905年上书政务处，主张地方自治，前者主张地方选举士绅组成共议堂，“破除壅蔽之积习，冀决是非于公论，使营私罔之官吏无所窃其威福，使草野之愚民皆得涵濡”；后者建议中西结合，在传统乡官基础上，兼容西式地方自治制度，乡镇成立“乡社”，府县成立议会。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国人普遍认为日本取胜之本在于实施立宪。受此刺激，立宪思潮席卷朝野，朝廷也反应迅速，同年7月即决定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归国后，竭力鼓吹立宪，期间内外官僚主张立宪的奏折也络绎不绝。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上谕，宣示预备立宪。经过多年研究讨论，各级官员和开明士绅逐渐达成共识——地方自治是立宪的基础和先导，地方自治的民间思潮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制度而得以实施。清廷相继发布乡镇、州府县地方自治章程及选举章程，最终促成省级谘议局的成立。1909年10月浙江谘议局成立，留日背景的议员人数虽只占13%的席位，却是极为活跃。两位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皆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褚辅成、阮性存等都是议员中的骨干力量，他们具备现代法政知识，年富力强，主导着谘议局的前进方向。同年浙局推选赴京资政员，十四个名额中，留日议员就占了九位。1910年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议，共提出十九件议案，其中由褚辅成、刘耀东、阮性存、沈钧儒、王家襄等留日议员提出的即占到40%强。

浙江留日议员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资政院的名额和议案的数量上，他们在会议中与官府交锋毫无退缩，言词坚定，彰显代议机构的主体意识，体现出集体的力量。1911年4月12日，浙江谘议局临时会议讨论龙元贴水问题、民政费用等案，《申报》曾有详细报道，有助于我们理解留日议员与官府的关系。

上午会议伊始，议员褚辅成就质问到场官员，一月前公呈巡抚的龙元贴水一案为何迟迟未批复。官员回答曰，官场与社会习惯使然。褚辅成立刻反驳：“是否法律不能战胜习惯？”官员又以划一币制困难搪塞，此时阮性存起言：“社会习惯甚痼，办理果难操切，然官厅既有明文禁止贴水，似须遵照实行，不能骑墙两可。”经过一番交锋，议员们迫使官员将此案请抚院速定批答期限，巡抚随即答应在五日后答复。

下午会议主要讨论民政费用，其中一项涉及省城及府厅州县巡警经费征收情况。巡警道员要求发表意见，议员褚辅成首先开其炮，认为此项预算系征收民政费，道员没有资格代表，应请布政使到会说明。巡警道员以退出会场要挟，议员阮性存、陈时夏、王世裕等群起斥责其扰乱会场秩序，要求议长照例执行，勒令复席。此时财政委员正拟登台演说，被褚辅成阻止，认为必

先规复秩序方能开议。巡警道员无奈勉强复席，自找台阶：“方才彼此误会，均为地方公益起见，并非各为私图”。沈钧儒则起言：“议员所希望者说明警费规定之内容，其余可从缓议”。道员服软，当众将原稿宣读一过，众议员再逐节质问。

参与质问发言的五位议员，阮性存、陈时夏、沈钧儒为留日人士，褚辅成是留日之同盟会员，王世裕早年参与徐锡麟光复会起义计划，是革命党人。申报的报道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于谏议局的掌控，而他们的组合似乎也预示着几个月后，立宪派与革命派将联手推翻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

议员们的行径，令保守官员非常不满，大学士陆润庠言道：

谏议局之设也，所举皆不谙掌故之议员，逞臆狂谈，箝制当道。督抚不得而禁之。其甚者，借筹款之名，鱼肉乡里；窃自治之号，私树党援。上年资政院开议，竟至戟手谩骂，藐视朝廷。以辩给为通材，以横议为舆论，众说沸腾，莫可究诘。

这条奏议本意为怂恿当局查禁各级议会，不无诬蔑之词，但议员们“众说沸腾，莫可究诘”之状，确也是事实。

四、革命：新旧阶层整合的粘合剂

受选举资格所限，谏议局成员大多为士绅和商人阶层，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中坚力量实为留日人士。随着新政的深入，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愈加扩大，不过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军队是最关键的力量。毫无疑问，浙江光复的主力是新军，而新军的起义，与留日军事人才的归来有着莫大的关系。

清廷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来编制新式陆军，留日人员能够较快地受到提拔，成为军队中的骨干，具有革命意识的年轻人和革命的政党都看到了这一点，意图控制军队。沈钧儒留学日本时，就跟革命党人有所接触，他虽然没有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但因为倾向革命，跟光复会领导人章炳麟过从甚密，所以也了解他们的一些计划。他自述道：“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在日本学军事，准备回国后参加到军队里去，有计划地进行武装革命。”光复会的领导层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徐锡麟、陶成章等人都决定捐官去日本留学。陶成章提出在国内接受军事训练教育显然不够，最好的办法是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后可以做官掌握兵权，实行革命。参与此事的陈魏回忆道：“徐烈士锡麟捐的是道台，填的是步兵科；陶烈士成章捐的是知府，填的是步兵科；陈志军捐的是知府，填的是炮兵科；陈魏捐的是同知，填的是骑兵科；龚宝铨捐的是同知，填的是工兵科。”他们的计划较为周密，五人中就涉及三项兵种。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浙江参与光复的军人并非全是光复会员或者同盟会员，革命并不是革命政党的专利。那些具有革命意识的年轻学生，多有自发赴日学习军事回国革命的举动。马叙伦、汤尔和、杜士珍将要到杭州府中学堂毕业时，因为学业优秀，学校预定派此三人到日本去留学，而他们却约定去学陆军，回国干革命。

从日本学成归国的军事人才中，蒋尊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1900年官费选送日本学习军事，期间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宣传，担任《浙江潮》编辑，提倡尚武精神，并成为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骨干人员。1906年接受浙江巡抚张曾敫的邀请，蒋尊簋回国组建浙江新军第二标，担任标统一职，“同人异常爱戴”，随后创办弁目学堂，以训练初级军事干部。号召力所及，全省慕名而至者众多，但因名额限制，录取了一百八十人。1907年第二标征兵，“全省因为听过武备、第二标弁目学堂和蒋伯器的关系，应征的人蜂拥而至，不多几时即征足逾额……成立的这些部队中，文理畅通、思想进步的人很多，后来浙江成立第二十一镇(师)时，就隐隐成了全镇的骨干”。他为浙江培养了大批具有革命意识的军人，奠定了浙江光复的基础。

新军吸纳留学人员(主要来自日本)的动向，已经引起朝廷的注意，一些重臣多有微词，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言：“各省编练新军，原以整军经武。乃军人既难合格，将领又复乏才。于是干城腹心之任，半以出洋学生承其乏。其中品地不齐，其不肖者无

论矣。即有一二贤者，亦于军事毫无历练。坐此弊端百出，不可胜言。”大学士陆润庠也谈到：“镇兵之设也，所用皆未入伍之留学生……甚至有不击同胞之谬说。国中有事，督抚非但不能调遣，今且反戈相向，其不可用也明矣。”

然而，从中央练兵处、陆军部和军谘府到地方的督练公所，从各类军职到各级军事学堂，到处活跃着日本士官生的影子。毫不夸张的说，日本士官生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军队的各个领域，如此尾大不掉之势，岂能仅仅以危言“停办”了事？

当然，日本士官生在军界实力庞大，但是并非掌控一切。就参与革命的浙江新军出身学校而言，分为浙江(武备、弁目)、保定(速成)、南京(陆军和将备)、日本士官等四个系统，各自有联系活动的组织，而日本士官一派与浙派联系较密切。总体而说，这些革命军人大多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在浙江光复运动中，来自各处的军人齐心协力，虽偶有摩擦，但都以反清革命为宗旨。“在杭州，光复会和同盟会，开会和办事有时在一起，不分界限，协力合作。”

1907年夏，光复会的徐锡麟和秋瑾起义失败后，当局察觉蒋尊簋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将他调往广西。就在新军的革命力量暂时消歇不久，是年秋天，更大的风潮在浙江蔓延，这场起源于沪杭甬铁路的运动很快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主要话题，激发着民众的爱国激情，削弱着各阶层对朝廷的忠诚，最终促成了清朝的覆灭。

早在1898年，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同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订立苏杭甬铁路草约，获得该路的修筑权。草约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1905年7月，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省铁路有限公司，汤寿潜担任浙路公司总经理，决定自修铁路，但是遭到英方的阻扰。为了解决绅商和英国的争端，1907年10月，清政府外务部抛出所谓“拟分办路、借款为两事”的方案：路由中国自造，但是需向英国借款。此方案一出，舆论大哗。

各阶层在挽回利权、爱国图存共同旗帜下，采取了集会抗议、通电政府、舆论抨击等各项手段。10月22日，杭州首先创立国民拒路会，并将主持此项借款的汪大燮等四人开除浙籍，苏州、绍兴、宁波也相继成立拒款会或拒约会，各地学校相继聚众抗议。留日学生十分关注此事，11月2日东京同乡会召开临时紧急大会，决定派陈学汶、陈时夏、金保稚、蒋观云等四人至杭据约会协办。民众的抗议使清政府颇为紧张，11月12日电寄两江总督端方等注意民变，“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近因苏杭甬铁路一案，各处绅民，纷争不已。难保无该党匪布散谣言，从中煽惑，阳藉争路为名，实则阴怀叵测。”迫于各方人士的压力，署浙江巡抚信勤在11月24日代奏浙江11府绅士115人公呈，自办铁路，不借外债。3天后，杭州举行声势浩大的浙江全省拒款大会，此次会议并不仅以抗议政府告终，组织者更有深层用意，他们把各个地域、阶层的人士组织起来会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近于地方会议性质，外府县各厅州县代表限定十人以内(计须七百八十座)，其他为官绅(如王中堂、柏研香)、商(商务总会)、学(如学务公所议长、教育总会议长)、军(如第一标、二标统及督练公所)、僧教育会、劳动界(如挑夫代表)、宗教界(如教会学堂)、及旅沪学会代表、苏路协会代表、苏浙两公司总副理，后者均需另备专座，惟女界尚未议定。”

这场拒款运动，浙江革命党人亦参与其中，并希望通过这场运动，宣传革命思想。位于东京的光复会总部曾致电浙江保路会，除表支持外，并提出“拒冯(冯汝骙，浙江抚台)、留信(浙江藩司信勤，此人对保路运动尚赞成，故东京电拟留他任巡抚)、救济(东京派留学生回国活动，到杭时，要保路会接济经费)”的办法。同时，光复会屡从东京致电会员，拟借保路运动，谋划浙江光复事业。同盟会在这场运动中，也有所行动，浙江光复中最主要新军将领之一顾乃斌，接受东京同盟总会的指令，将两千份抵制政府之印刷物(不完粮、不纳税、谋浙江独立)，在会场分送。军界人士亦痛恨盛宣怀，认定其为卖路罪人，1908年春大学士王文韶去世后出殡，听闻盛宣怀将至杭州吊唁，夏超、顾乃斌等人决定于西湖边盛宅等候，当面羞辱，后因盛未来杭州，遂有火烧盛庄的计划。

这场拒款运动虽未完全达到目的，却直接促成了各个阶层的动员和整合，相对封闭的新军因此加强了与政界、学界各等人物的交流。在浙江自治运动中十分活跃的留日人士褚辅成就在此时与军界相熟，其后一直参与军界的密谋反清计划。他在1909年进入谘议局后，俨然成为商绅代表与新军之间的桥梁。

1910年8月，盛宣怀新任邮传部右侍郎，浙路公司总经理汤寿潜愤而上书军机处弹劾之，清廷反应迅速，次日将汤氏“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以为沽名钓誉巧于趋避者戒”。愤怒的江浙立宪派立即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与1907年拒款抗议不同的是，此时的浙江已经有了民意的大本营——谘议局，能与官府直接对话，并被赋予了合法斗争的权力。谘议局将汤寿潜罢职事件视为紧要事件，呈请巡抚增韞召集临时会，遭到拒绝。10月3日，谘议局第二届常年会开幕，立刻变更原有的议事安排，提议争回浙江铁路商办事件，议员议决后呈请抚院代奏，并于即日始停议待奏。增韞不允，从10月6日到19日连续五次行文谘议局，要求开议，但遭拒绝。此后双方争执日益加剧，增韞不甘示弱，援引谘议局章程，以“逾越权限，不受督抚劝告”为由，两次致函浙局，处以停会共六日的惩罚。

清政府在浙路事件上屡次触及浙江民众的底线，而同时期国会运动召开日期的拖延，更是羞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也一步步地把谘议局和革命的新军推向了更加紧密的合作，满清已了无希望。

最终结束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力量是新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在上海的陈其美、黄郛等同盟会员或亲自赴杭，或频频派人与浙江新军接洽，这些多有留日背景的革命领导者谋划了较为周密的起义方案，决定军事方面由顾乃斌、朱瑞领导，政治方面由褚辅成联络谘议局两位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议员张传保等人涉及筹备。11月5日凌晨，新军十分顺利地光复了杭州，第一任浙江都督由深孚众望的汤寿潜担任。各地受杭州影响，纷纷独立，浙江的光复终呈水到渠成之势。

综观晚清浙江历史，留日人士影响力至关重要。无论是走和平途径的1901年-1903年拒俄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07-1911年浙江保路运动，还是对清廷已不抱有任何幻想，从事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行动，都活跃着留日人士的身影。遥想一千多年前遣唐使，给日本带去了深刻变化，一千多年后，奔赴日本的中国学生，给中国带来了变革的力量。时光流转，令人感概。